

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 对非洲政策比较

李新烽

内容提要 郑和七下西洋四处非洲是新中国成立前中非关系发展的顶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成为古近代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范例，为发展中非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在依托友好交往、重视高层互访、遵守平等自愿、互惠互补的贸易政策与交往原则，以及交往使者在其中体现的吃苦耐劳、恪尽职守为国效力的精神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比较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与“厚往薄来”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传承与扬弃。当然，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大大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局限性，具有战略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点，实现了对非洲政策的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中非关系 郑和下西洋 异同性 厚往薄来 坦赞铁路

作者简介 李新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 100007）。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 28 年，其首航时间距今已 605 年。以当代意识审视这一重大事件，¹ 再以历史的深度思考当代中国的对非洲政策，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观察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逻辑关系，而从这些关联中，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威力、魅力与活力。

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相似性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与郑和下西洋四处非洲的总方针，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郑和下西洋四处非洲与西方殖民者登陆非洲、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与西方国家的非洲战略之间具有实质性区别，中非交往贯穿友好主线

14 世纪和 15 世纪之交，在东方崛起的大明帝国，尽管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显示出强大实力，但是这种实力不是靠对外侵略与掠夺发展起来的，而此时发生的郑和七下西洋更不是为了对外侵略与扩张。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的打算，因为中国人——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不同——对于向其他

¹ 学界曾对郑和下西洋的路径及意义作过探讨，例如陈公元：《“三保太监”下“西洋”》，载《西亚非洲》，1980 年第 1 期，第 64~67 页；郑家馨：《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中国的关系》，载《西亚非洲》，2005 年第 2 期，第 47~54 页。

地区扩张不感兴趣，也没有与他人进行贸易的强烈需求”。¹ 因此，郑和使团所到之处就能与当地居民平等相待，友好交往。

在郑和下西洋终止半个多世纪以后，葡萄牙殖民者登陆非洲，筑堡垒，建商站，大肆掠夺；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紧步葡萄牙殖民者的后尘，相继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侵占非洲土地、掠夺大陆资源、欺压当地人民，与中国没有占领非洲一寸土地、没有掠夺非洲一分财产、没有贩卖非洲一个人口行为形成天壤之别的对照。正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纪念民主南非十周年和中非伙伴关系论坛所言：“历史告诉我们，在几百年前，不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野蛮人。虽然远隔重洋，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福祉依赖于另一方的幸福生活，这一意愿所反映的基本理念闪耀着人类的人性光辉。正是基于这一意愿，15世纪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所带来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随着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而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毁灭与绝望。”²

时至今日，前欧洲殖民宗主国仍难以割舍其“非洲情结”，把非洲当做自己的“狩猎地”和“后花园”，居高临下地向非洲国家和人民发号施令，理直气壮地对非洲事务指手画脚。相反，中国始终把非洲当做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平等相待，坦诚相见。在此基础上，中非关系已形成明确的理念——“友谊、和平、合作、发展”，并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认同与称赞。

（二）郑和访问非洲同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共同体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官方对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关注与重视

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四处非洲是没有疑问的，但郑和本人是否访问过非洲、是访问一次还是多次，却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郑和本人根本就没有去过非洲，而是坐镇东南亚一带指挥、遥控。

其实，关于郑和本人是否到访过非洲本不应是个问题，因为《明史》里有明确记载，且不止一处。“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刺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不刺哇，与木骨都束接壤……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繁，风俗颇淳。郑和至其地。”³ 另外，《明史》还有郑和访问非洲比刺、孙刺两国的记载：“又有国曰比刺，曰孙刺。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⁴ 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教授指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四次访问非洲，郑和每次都去，永乐年间三次，宣德年间一次，这从以上诸传中亦可看出。”郑和既然来到非洲，都是顺访能够到达的非洲诸国，同时也负有护送各国使节回国的任务。郑和四访非洲，充分体现了明朝廷当时对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视程度。⁵

在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一书中，首次向人们具体介绍了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三国，对这3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居住特点、气候变化、生产经济与物质资源、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军事状况等，都作了翔实记载。在郑和使团中，马欢、费信都是高级译员，极有可能就是郑和等使团领导成员的随从翻译，再对照其后葡萄牙人对所见非洲东岸诸邦国建筑风格的记述，与费信亲见所述相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郑和、费信确实到过非洲东岸诸邦国。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确凿证据，所以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时，有的虽对中国人是否在远洋航海有了较大发展的宋、元时代到过非洲，存在着不同观点，但对郑和到过非洲，却没有任何怀疑。如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中指出，“直到十五世纪，著名的海军将领郑和才在东非沿岸”，“中国人在早年看来并没有越过印度洋的东部海面，尽管他们的船只和装备有可能把他们带到更为遥

¹ [美国] 珍妮特·波特、史蒂文·安佐文著；陈慧颖译：《文明脚步——影响世界的探险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6~297页。

² 李新烽：《非洲踏寻郑和路》，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³ 《明史》卷326《木骨都束传·卜刺哇传·竹步传》。

⁴ 《明史》卷326列传214·外国七。

⁵ 参见郑一钧教授致李新烽信，2009年9月25日。

远的地方去。”¹ 巴兹尔·戴维逊的这种观点尽管带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他肯定郑和到过非洲，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和之多次访问非洲，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世界公认中国早于欧洲发现这块“新大陆”的历史见证。²

郑和本人访问非洲，非洲诸国的国王和使臣亦随郑和船队访问中国。郑和本人后几次亲赴非洲的使命之一，就是送这些使臣回国，这足以说明非洲来访者的身份之高。”

历史具有相似性。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亚非 16个国家同时派遣多达 1 200 余人的使节来访；2006年，非洲 48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官同时云集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此两种盛况，为中国历代所未有，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史上书写了奇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篇章。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郑和访问非洲给予了高度评价。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东非期间，在演说中指出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曾访问过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为中非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也多次高度评价郑和船队访问非洲、为发展中非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2005年我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郑和所到访问过的非洲国家对此也皆有不同形式的反映。

郑和下西洋首航时间距今 600 多年过去了，尽管中非之间的交往出现过间隔和波折，但“高层互访”仍是今天中非关系的显著特点之一。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这种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都是当年郑和无法相比的，但其中蕴含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平等坦诚、求同存异、互惠互补、合作发展一直体现在这种互访和交流之中。

（三）方物交换、经贸合作共同贯彻了中非之间平等自愿、互惠互补的贸易政策与交往原则

郑和是中非官方贸易的开拓者，他率领的船队 4次远航非洲多国，与东非沿岸的国家和民众进行自由的商业贸易，使中国与遥远的非洲实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货物交换，中非人民的眼界因之开阔，见识因之增长，丰富了中非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双方贸易的互补性是进行这种海外贸易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

对当时的非洲国家而言，没药、乳香等土特产是再平常不过的货物；而对遥远的中国来说，这些方物乃稀世之宝，就连非洲的长颈鹿在明朝中国人眼中也成了“神兽”。这让中非之间在郑和使团的贸易中互通有无，双双获益，这种互补性是当时中非贸易得以顺利进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600多年过去了，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仍是中非贸易的一大特征，也是中非贸易额不断攀升的一大动力。中国的机电产品、纺织品、轻工产品等以其物美价廉受到非洲民众的青睐，而非洲丰富的矿产、能源又是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同时非洲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人前往观光。至于中非之间越来越广泛深入的经贸合作，则是中非关系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郑和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一切，皆因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而充满活力与发展前景。

（四）郑和使团不畏艰险远赴非洲与当代中国外交人员不辞辛苦坚守非洲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延续，共同继承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恪尽职守、为国效力的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

在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中，明朝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除明朝皇帝锐意与世界各国通好

¹ [英国] 巴兹尔·戴维逊著；屠倍译：《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 271~272页。

² 参见郑一钧教授致李新烽信，2009年 9月 28日。

» 我国史书中曾有古麻刺国国王来访，不幸病世，被厚葬于福建闽县的记载。如《明皇世法录》中这样记载：“古麻刺（即麻林）国在东南海中。永乐十八（1420年）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来朝贡方物，请封给印诰。令仍旧号。次福州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时祭焉。”明朝严从简在其编的《殊域周咨录》也记载了这件事：“永乐中，（麻林）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朝，至神州卒，诏谥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岁祭之。”（以上两段引文转引自艾周昌、沐涛著：《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77页）对此，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教授经过考证认为，文中所说的“古麻刺”国不是位于东非的“麻林”，而是南洋国家，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在棉兰老（Mindanao）岛，又作民多朗；一说是吕宋岛博利脑（Bolinao）角附近的一个岛（Cabamuyan）。严从简这里记麻刺国国王来访，是误与麻林国混为一谈。

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以郑和为首的一批外交家以超人的毅力尽职完成使命。在交通不便、世界地理知识有限、中非相距十分遥远的情况下，以郑和、王景宏为代表的这批杰出外交家不畏艰险、不辞辛劳、不怕牺牲，尽全力与东非沿岸各国交往，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们中的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永久长眠在异国他乡；船难幸运逃生者也永远地滞留在遥远的地方；落难在肯尼亚帕泰岛的郑和使团成员就是其中的例证。

今天，在中国驻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身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年的郑和精神：乐于吃苦、勇于奉献、忠于使命，在外交前沿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长期与当地的贫民窟为邻，驻南非的中国外交官时常受到犯罪分子的扰乱，更有个别国家的中国外交官在战乱中坚持工作……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非洲七国时对中国外交人员说：“我要感谢同志们，这里生活确实比较艰苦，如果说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国内的条件也不是很富裕，那么现在比起来，这个地方要艰苦多了，所以我感谢同志们在这里安心工作，为国争光。”¹

援建坦赞铁路同明朝“厚往薄来”的联系与区别

援建坦赞铁路与明朝外交礼仪上的“厚往薄来”，共同说明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和两相情愿的礼尚往来在中非交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此，需要厘清“厚往薄来”、“朝贡贸易”和“海外贸易”这几个概念。

首先，“厚往薄来”与“朝贡贸易”具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外交礼仪，属于政治范畴；后者是对外贸易，属于经济范畴。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²而且规定：“凡诸番四夷朝贡人员及公侯官员人等，一律给赐。”³这是明朝对世界各国实行怀柔政策，对待海外国家朝贡的基本立场。郑一钧认为，“厚往薄来”是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孬多寡与进贡次数的，凡有进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海外国家远来中华的诚心。虽然这样做使朝廷在物质上、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但在政治上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需要明晰的是，“厚往”的只是回赠海外远道来华访问时向明朝政府贡献的礼品。海外国家来中国访问时，在宫廷内献上相对较薄的“贡品”，明朝政府同时“赏予”相对较厚的“赏品”，这并不是拿“赏品”来跟“贡品”进行交易。这种“厚往薄来”的行为，不是一种贸易行为，而是一种外交礼仪。同时，中国“厚往”的“赏品”虽然相对较厚，但也不是“厚”得出乎意料，让中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的代价，而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的。

关于“厚往”的规格，明成祖亲自定夺：“朝廷驭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赆，虽加厚不为过也。”⁴永乐十九年（1421年），朝廷对朝贡者的赏赐作了具体规定：“三品四品，人钞百五十锭，锦一段，纁丝三表里。五品，钞百二十锭，纁丝三表里。六品七品，钞九十锭，纁丝二表里。八品九品，钞八十锭，纁丝一表里。未入流，钞六十锭，纁丝一表里。”⁵就在该规定实施的当年，卜刺哇、木骨都束等国“遣使贡名马方物，命礼部宴劳之”，“使臣还国，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赉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⁶

所谓“朝贡贸易”，是指外国贵宾在来中国朝贡期间，在完成“厚往薄来”的礼仪后，被允许将附带的货物，在规定的的时间和地点、按照朝廷有关规定进行的平等、公平的“两平交易”；是在中国

¹ 李新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推己及人——记温家宝总理出访非洲七国》载《大地》，2006年第14期，第17页。

² 《明太祖实录》卷71。

³ 《明会典》卷111《礼部69》。

⁴ 《明成祖实录》卷119。

⁵ 同上。

⁶ 同上。

进行的国际贸易。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由国家垄断，“朝贡贸易”也就成为国内唯一的国际贸易形式，也是朱元璋时期唯一的国际贸易形式，其时没有在海外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贸易。

郑和下西洋时期，国家的对外贸易分为两部分，一是延续“朝贡贸易”，而这部分交易量很有限，更多的则是郑和船队在海外进行的大规模贸易和民间互市活动。

其次，“朝贡贸易”与“海外贸易”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异之处。相同性表现在，两者皆属于对外贸易这一大范畴，共同遵循等价交换的贸易原则。不同之处表现在，一是进行贸易的地点不同：前者在国内——中国皇都的会同馆，后者在国外——海外诸国，即郑和船队所访问的国家。二是进行贸易的时间不同：前者规定在3~5天内完成交易，后者则不受此规定限制。《明会典》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凡交通禁令各处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¹ 关于郑和使团进行海外贸易的时间，马欢在《瀛涯胜览》（古里国）中记载，在古里国每做一笔生意，要会同该国的商人富户与会计人员等，在一起看货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²。三是市场运作方式不同：前者对市场进行规范管理，对外宾的政策相对宽松；后者则入乡随俗，与各国商人进行平等交易。明成祖朱棣曾对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³ 但是，进入会馆参加“朝贡贸易”的外宾必须先“朝贡”，“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⁴

再次，无论是“厚往薄来”，还是“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其运作方法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公平诚信，自觉自愿。以“厚往薄来”为例，外国使者前来朝贡，拿何种贡品，数量多寡，皆自己做主，明朝廷对各国的贡物并无特别要求，当然贡物多是各国的土特产品；明朝皇帝赏品的种类与数量，当然也是由皇帝决定，且质量和数量超过贡物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对“朝贡贸易”进行规范，也是为了保证交易公平，诚信无欺。郑和使团的“海外贸易”更是尊重对方，公平合理，买卖自由。也正是因为奠基于公平诚信之上，双方的贸易才能够持久进行。

把历史的“镜头”从当年“厚往薄来”的外交礼仪切换到当代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我们从中发现，两者间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

首先，两者都是把这种经济上的“厚往”和援助当做一种外交礼仪，从政治角度来对待和完成的。明成祖朱棣“远慕唐宋宾服四夷之盛”⁵，追求四海安宁，万邦来朝，与中国“共享太平之福”，“超三代而轶汉唐”的政绩，主要通过“宣德化而招徕之”的方式，而“厚往薄来”便成为一种最佳选择。与封建帝王相比，新中国领袖绝非追求那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⁶的盛况，而是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出发，做出援建坦赞铁路这一战略举措的。对于坦、赞两国领导人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⁷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马里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典范，它与这个时期中国把对外援助视为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密不可分。

其次，中国对这种“厚往”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把这种帮助视为己任，既非居高临下的施舍，亦非为了对方回报而为之。换言之，将经济问题感情化，意在真诚待人，感动人心，结交朋友。明朝廷对来朝者“厚往”，目的之一是感化异邦，让四夷心悦诚服地“宾服”，感受明帝国的强

¹ 转引自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²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³ 《明成祖实录》卷12上。

⁴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第85页。

⁵ 何乔远：《名山藏》。

⁶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 参见（宋）刘克庄选编、李牧华注解：《千家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⁷ 张铁珊编著：《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大，并无其他私心杂念，更无掠夺征服之心。新中国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视为己任，是因为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真心朋友来帮助，朋友间的帮助是平等的，不求回报的，其主要目的是真心期望这些国家通过中国的帮助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毛泽东主席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说：“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¹

再次，就当时中国的国力和中非之间的交往而论，这种“雪中送炭”式的“厚往”与援助，更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换言之，将经济问题道德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宽以待人、急人所急、帮人所需的传统美德。明朝的“厚往薄来”是一种优待宾客的礼尚往来，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更多的是急人所急。“患难见真情”，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投入如此之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援建如此大规模的坦赞铁路，除政治和感情因素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最后，从明朝的“厚往薄来”到当代的援建坦赞铁路，折射出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说明中国的发展、强盛和文明不但在惠及中国，而且在惠及世界。“人们看到，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²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坦赞铁路是当代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中非友谊的一曲赞歌，是“万隆精神”与中国援外“八项原则”的物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一条铁路，成为一个符号与象征。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差异性

由于明朝中国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际环境大相庭径，特别是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迥异，二者相异程度远大于相似性。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大大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性，具有战略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点，实现了对非洲政策的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一）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突破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强盛阶段，皇权高于一切。尽管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是封建制度自身的弊端终使这一人类向海洋进军的壮举和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昙花一现，嘎然而止。世人普遍为郑和下西洋不能持续而扼腕叹息，然而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无论是做出下西洋决策的封建皇帝朱棣，还是奉命远航的船队总兵郑和，皆无法避免其所处时代的局限。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感情纽带和规范的合作机制，因而能够持续发展。中非双方彼此平等是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石，加之中国和非洲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现在又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相似的命运、共同的目标把中国和非洲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时，中非关系在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保证了中非之间定期集体会晤，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是在互利双赢的经济前提下和交流互鉴的文化沟通中进行的，因而能够稳定

¹ 张铁珊编著：前引书，第56页。

² 《人民日报》2009年10月5日。

³ 胡锦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日。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绕不开利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不例外，但是双边的经济往来是互利共赢，彼此受益；在文化交流上互相借鉴，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明成祖朱棣在谈及郑和下西洋时指出：“恒遣使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¹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向海外诸国颁发中国历法，其内容包括明朝政治、社会、礼俗的各个方面，作为范本让海外诸国遵循。换言之，郑和下西洋对海外诸国主要是单向地宣扬中国文化，而非文化双向交流。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面向全非洲开展多渠道、宽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外交活动，因而能够全面发展。而受当时地理知识和交通状况的限制，郑和船队当年访问的仅是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未能涉足非洲内陆，同时双边贸易的数量和物品种类与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当代中国与非洲是全天候的朋友，对非洲关系面向所有非洲国家，双边交流的范围涉及所有领域，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之间的全方位外交。温家宝总理指出，中非经贸合作日益深化，“2008年中非贸易突破千亿美元，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非洲国家增加到 53 个；中国在非洲开工建设 6 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落户增加到近 1 600 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78 亿美元；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合作方兴未艾。”“人文交流蓬勃开展。文教、卫生、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迅猛，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员年底以前将达到 15 000 人，青年、妇女、友好省市等领域的交往日趋频繁，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²

从温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仅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而言，中非之间这种全方位外交，一是指中国与非洲所有国家交往；二是指与每个非洲国家的所有领域进行交流。中非之间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之上，没有非洲国家的大小贫弱之分，更没有非洲国家的资源丰富与贫乏之别，那种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是为了抢占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二）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性，具有战略性、互动性和突破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领导人就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中国又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换言之，中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中非关系，这种战略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并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第二代、第三代和现任中国领导人重视中非关系，强调援助非洲既要重视投资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又要重视增强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还要求中国企业树立自己的形象、注意环境保护、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还表现在派遣中国海军首次远洋护航。索马里海盗猖獗一时，中国过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商船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中国商船和船员的安全，应索马里过渡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舰队开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海外媒体认为这是 600 年后“郑和再来”。郑和当年开辟了中国海军非战争运用的先河，在东南亚一带打击海盗受到各方好评。不过，郑和是在下西洋途中遭遇海盗，为民除害；这次中国海军远征是专程为过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国船只护航，是中国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的出征，是中国利益远洋化对海军提出的新要求。这是中国外交的大手笔，意义非同小可。

互动性是指中非关系是双向的彼此合作与共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非就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历史浪潮中并肩战斗，在振兴民族经济的艰辛历程中携手同行。坦赞铁路、援非医疗队、青年志愿者，是中国无私帮助非洲的生动例证；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北京奥运圣火在非洲顺利传递、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热心捐款，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情谊的真实

¹ 朱棣：《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56页。

² 温家宝：《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9日。

写照。”¹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因基础坚实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具有突破性。这主要是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和八项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在 2006 年 11 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中国政府将采取 8 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信守承诺，三年过去了，八项举措全部得到落实。2009 年 11 月，在埃及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为不断深化中非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温家宝总理又宣布了新八项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把中非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使中非关系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三）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彰显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当代的鲜明特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国际性

中国与非洲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这主要因为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关键是我们发展相互关系中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正确原则。”² 温家宝总理强调，中非友好关系“患难与共、相互支持是基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核心；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关键。”³

郑和下西洋时期，尽管郑和使团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⁴的精神，但是封建皇帝追求的是“万国来朝”和“四海宾服”，以期实现所谓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际天所覆，极地所载，莫不咸归于德化之中。”⁵ 这里的“一视同仁”指郑和使团所访问的海外诸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强大的明帝国则居高临下，让他们来“朝贡”、“宾服”。而非洲的前殖民宗主国在殖民时期奴役着广大非洲国家，时至今日仍以‘主子’的态度看待非洲、对待非洲。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非洲的尊重，是因为中国首先尊重非洲，平等对待非洲。

中国平等地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平等地对待非洲各国人民，这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人民与非洲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相反，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支持和帮助非洲发展；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开放透明的，是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存在结盟与联合对抗第三者，更不会妨碍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相反，中非双方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有利于带动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帮助非洲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关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与战略性和国际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非关系的国际性表现在中非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和协调，照顾彼此关切，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以推动均衡和谐的全球发展。同时，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信任、协调配合，有利于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人口占世界人口 1/3 以上。仅这一点，中非关系在当今世界上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的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已经证明也必将进一步证明，中非关系的健康全面发展必将造福中国和非洲，必将造福发展中国家和全世界，必将造福全人类和未来。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温家宝：前引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9日。

² 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³ 温家宝：前引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9日。

⁴ 《明成祖实录》卷 23。

⁵ 郑鹤声、郑一钧编：前引书，第 863 页。

The Sheikh School and Its Political Theory

Wang Feng

pp.32- 37

The Sheikh School was the non-mainstream teachings school of 12 Imam Shiite trib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origin of conformation of the Sheikh School was that the Shiite believers lost their patience for a long time i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clusive Adventist Imam.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Sheikh School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hiite ideas and Sufism in history, and later Sufism

was stripped out from the mainstream Shiit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Isfahan School also had an impact on Sheikh School, but there were also hug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re are great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que doctrines of Sheikh School and the thought of the mainstream teachings of 12 imams, and which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pua Movement and the Baha'i sect.

Exploration of the Somali Islamic Radical Militant Group

Fan Xiaohong

pp.38- 43

Since the fall of Siad Regime in 1991, Somalia has been in the warlord era, and effort of the national building has not met with success. Such factors like the weary of protracted civil war, the relatively stability in occupied Islamic radical area, influ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spurred the rapid rise of Islamic militant groups, which also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of Somalia more complicated. The ideology of building the fundamental Islamic state was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social basis, and

contradict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Sufism and tribal inconsistent, the Islamic group won no recognition from US-l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But the Islamic group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ing Somalia state and will make great influence in future.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eace in Somali should be based on establishment of a powerful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all political forces, strengthening of the identity of Somalia nation, and weakening of the tribal boundaries.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s and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Li Xinfeng

pp.50- 57

Zheng He's seven voyages to western oceans and four of them boarded on Africa which reached the top of Sino-Africa rel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voyages had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which set a good communication sample between nation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is historical incident also formed a good basis for developing contemporary Sino-Africa relation.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like Zheng He's voyages, relies on friendly exchanges, emphasizes on high-level visits, complies with equality, mutual benefits and comp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rade policy and relations, as well as exchanges in which the embodiment of hard-working

messengers fulfill their duties to serve their country in the spirit context, reflects the co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ame strain. Compared the assistance of building of Tanzania-Zambia Railway with the voyages of "thick to thin to", we can clearly fi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African relation in 600 years and 60 years of heritage and discarded. Of course,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is far beyond the era of Zheng He limitations, which has strategic,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and other notable features, and China's Africa policy has fulfilled sustainable, stabl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